

新聞大學

XIN
WEN
DA
XUE

6

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 闻 大 学

XIN WEN DA XUE

新 闻 大 学

第 六 期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

《新闻大学》编辑部出版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 303 号

印张 8 字数 232,000

定价：0.65 元



亚运会中，上海选手朱建华跳出2.33米成绩，为去年世界男子跳高的最好成绩，被称为“最佳运动员”。

做好报道工作，用以显示我国的体育发展水平，激励人民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提高民族健康的素质。

我国的体育摄影记者是非常缺乏的，体育摄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体育摄影有它本身的规律，对体育摄影记者要求有高度熟练的摄影技术，具备一般体育知识，了解各项运动的特点和各种竞赛节目的拍摄要求，眼快手快，临场不乱，否则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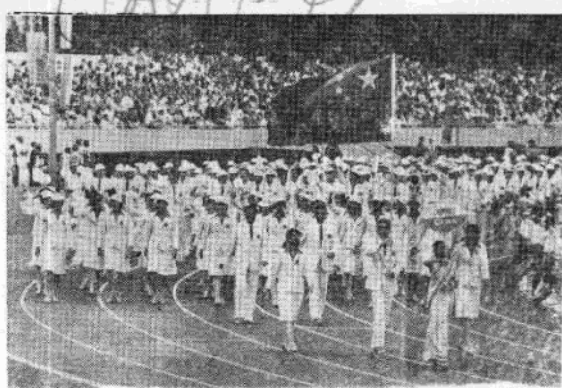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年在上海举行，全国摄影记者应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体育新闻照片来。



贺战友获得金牌 女子跳板跳水冠军李艺花(右)获得金牌，受到亚军阎淑萍的祝贺。

“佳妮腾越”

上海十七岁选手吴佳妮于去年亚运会体操比赛中，一人获得高低杠、平衡木两项冠军。图为吴佳妮正在高低杠上做分腿腾越动作。这项动作去年被国际体操协会命名为“佳妮腾越”。



第九届亚运会开幕式，我国代表团高举五星红旗，以堂堂阵容进入会场。

振兴中华·发展体育

拍好体育新闻照片

·舒宗侨·

(新华社记者胡越、刘心宁摄影)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样，突飞猛进，在世界体坛上连连获得优异的成绩，为振兴中华做出榜样。第九届亚运会中，我国获得各项比赛的团体冠军。

为了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争取国际荣誉，对全国新闻摄影界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拍好体育新闻照片，



研究摄影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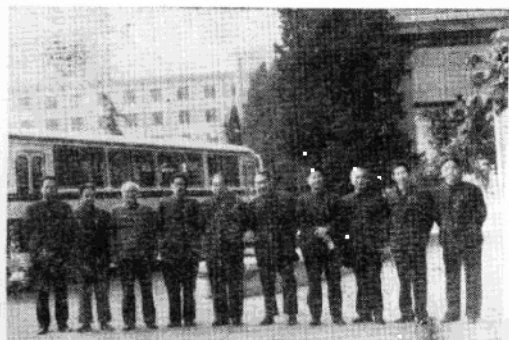
发展图象事业

我国开始编写《中国摄影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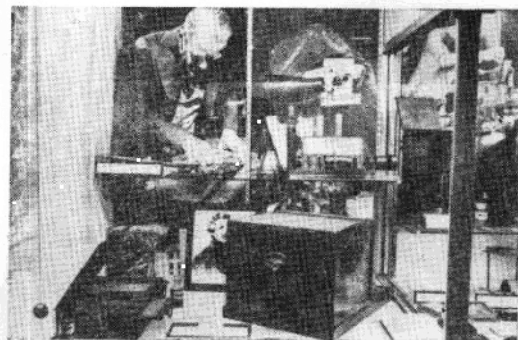
随着世界图象事业的迅速发展，各国均重视摄影历史的研究。许多国家设立了摄影历史博物馆，举办摄影史料展览，编写世界摄影史和各国的摄影史。摄影史的研究，将从各方面总结摄影的历史经验，促进图象事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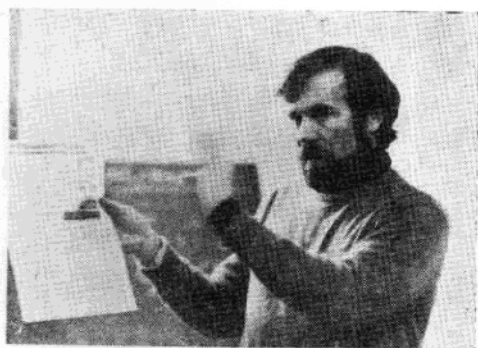
伦敦柯达工厂的摄影博物馆，陈列着十九世纪上半叶摄影技术发明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摄影器材和有关历史资料。（夏道陵摄）



我国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中国摄影史》的编写工作，组成编委会和编写组。上为全体编写组成员去年底在北京集会留影。（舒野摄）



摄影博物馆人员正在布置英国著名科学家 S. F. 塔尔波特的展览材料。塔氏在 1840 年发明用纸底板从负片翻成正片，从而奠定现代摄影的基础。（夏道陵摄）



美记者到复旦讲学

美国《进步》杂志总编辑劳伦斯·沃尔什，应复旦大学新闻系邀请，于 1982 年 11 月到该系讲学。图为他正在为新闻系研究生讲授“新闻写作与美国报纸现状”。（颜志刚摄）

發 售 報 申

頃本埠西官接到京都電信謂北京法國公使署於昨日下午下旗謝公使於昨晚出京然則中法和議從此作罷論矣事關重大特發單張分送俾眾週知不取分文如有賣報人作弊私賣請文閱者勿受其欺可也 七月初二日十一點鐘發

百年前的申報外

右为一八八四年八月廿二日（清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申報在中法戰爭前夕发行的一张号外。这次号外报道了当时中法形势紧张，法代公使谢满禄离京的消息。（清参看本刊第五期第七十六页）（照片系文由化提供）

(1509/24) DA0f/02

目 录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	陈大维 (1)
试析马克思早期人民报刊思想	丁 名 (7)
马克思与新闻学	徐培汀 (11)
马克思心目中的“党刊”	黎 汶 (13)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	
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办报方针的斗争	严 石 (17)
我国近年来关于马克思的新闻活动和报刊	
思想的研究简介	谷 明 (24)

采 访 与 写 作

论经济报道(下)	夏鼎铭 (26)
谈谈教育新闻	吴培恭 (30)
“当惊世界殊”	耿维海 (33)
——长江葛洲坝工地新闻报道回顾	
关于晚报的新闻	朱家生 (36)
读报随笔	李良荣 (37)
科技报道要通俗、形象、生动	吴万里 (40)

• 编辑与评论 •

怎样组织版面(下)	叶春华 (41)
报纸评论随感(四)	金师云 (43)
省报理论宣传浅探	胡 光 (45)
新闻评论的说理	丁法章 (48)
知多易识新	张子让 (52)
日本报纸新闻标题的变化	王之安

|| 报史知识 ||

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	
的办报思想	王 中 (54)
新闻事业的一场大变革	马光仁 (60)
——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单位的前前后后	
邓拓和《晋察冀日报》	周胜林 (64)
回忆《申报》采访部及其他	孙思霖 (67)
捷尔任斯基与报刊	闵大洪 (71)



中国报刊史料两则·····	徐载平 (73)
《各国消息》介绍·····	章玉梅 (74)



美国新闻观念的演变(之三)·····	陈 乔 (76)
《美国之音》一瞥·····	巢学忍 (78)
美国电视琐谈·····	倪 稼 (82)
大众传播的接收对象·····	俞 旭 (83)
英国的免费报纸·····	胡玉明 (85)
访美国的一家乡村周报·····	居延安 (86)
马岛新闻战·····	潘玉鹏编译 (87)

· 新闻教育 ·

美国新闻教育的演变与特点·····	郑北渭 (89)
记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张国良 (93)

· 摄影· · 图片 ·

开展《中国摄影史》的编写工作·····	舒宗侨 (95)
第九届亚运会的摄影采访·····	胡越 刘心宁 (97)
报道先进人物的图片佳作·····	颜志刚 (99)
摄影曝光技术问答(六)·····	马棣麟 (100)

· 名记者 ·

政治记者黄远生·····	罗 星 (105)
--------------	-----------

11 写作纵横谈

天涯何处不识“君”·····	栾 庭 (109)
----------------	-----------

古文赏析

传神写照·····	冯志伟 (110)
——宋濂的《秦士录》读后	

· 基础写作 ·

杂文的形式之“杂”·····	林 帆 (112)
----------------	-----------

· 教学参考 ·

宣传·····	陈韵昭摘译 (115)
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 的概况·····	祝建华 吕继红 (118)
列宁报刊活动编年·····	闻言 秦中河 (120)

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八三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 一九八三年六月出版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

陈大维

马克思恩格斯自从踏上政治舞台以后,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进步的和革命的报刊活动。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报刊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并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报刊思想。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德国和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各国工人政党相继产生,党的报刊活动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各国(首先是德国)工人政党报刊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地、多方面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党报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见解。从他们一生报刊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些观点和见解也正是他们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思想的比较集中、比较成熟的体现。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党报问题上思考和谈论得比较多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关于党报必须遵循党的政治纲领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党的政治纲领看作是党报的灵魂。他们认为,党报是党的一面旗帜,也是人们了解党的主张的一条重要的途径。为了在党的报刊上正确而坚定地宣传党的理论和党的主张,党报的一切活动就必须遵循党的政治纲领。否则,党报刊登什么样的报道、评论和文章,就没有一个选择取舍的标准;在人们眼里,党的主张和要求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党的报刊也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主编《新莱茵报》时,就是这样做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回忆道: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1]

恩格斯为什么使用“《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这样的提法呢?简略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我们知道,《新莱茵报》实际上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进行活动的,而当时的特殊情况是:《新莱茵报》编辑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领导机构,是由几乎完全相同的人们组成的。马克思本人既是《新莱茵报》的主编,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的领导人;而恩格斯以及参加编辑部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另一方面,在1848—1849年革命中,《新莱茵报》曾经作为革命的组织中心在斗争中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这张报纸来实现对这场革命的政治领导的。因此,在党的领导机构同党报编辑部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所以恩格斯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党的政治纲领”和“报纸的政治纲领”这两个概念也就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我们只要把它同马克思恩格斯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对照一下,就很清楚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认为,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确立了党报的活动必须遵循党的政治纲领的原则。而到了他们的后期,尤其是在德国党内因“反社会党人法”的实施而出现思想混乱、机会主义思潮抬头并不断地干扰党报工作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报遵循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的问题,更是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为了帮助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同以卡·赫希伯格为代表的

党内改良主义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宣布在德意志帝国全境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在国外(苏黎世)继续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党的领导人委托在苏黎世编辑《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党员卡·赫希伯格、卡·奥·施拉姆和爱·伯恩斯坦进行筹备工作。然而,“这三个人全都是最平庸的资产者,和平的博爱主义者”[2]。他们在接受了筹备出版新的党的机关报的委托之后,又在《年鉴》1879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第1册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文章中断言党犯了错误,而其错误就在于“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他们认为,在反社会党人法存在的条件下,党不应该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应该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与此相适应,他们对将要出版的新的党报的方针作了这样的表述:“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3]。

《回顾》的发表和赫希伯格等人企图为新的党报确立一个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的活动,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警觉。“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报纸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4]他们敏锐地看到,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一旦确立,不仅尚未出世的新的党报将带有先天的错误,而且整个党的事业也将受到重大的损害。于是,他们在迅速交换了意见以后,立即起草并发出了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领导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封带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中,深刻地批判了《回顾》一文所包含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指出,赫希伯格等人所主张的,不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是对旧的社会制度作“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因此,这些人“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5]马克思恩格斯表示,他们坚决反对为党报确立这样一个明显错误并带有浓厚投降主义色彩的政治纲领,明确宣布:“如果党的机关报按这篇资产阶级文章的精神行事,那么我们将公开表示反对。”[6]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下,党最终拒绝了赫希伯格等人企图强加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那个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刊登在创刊号上的由报纸出版部和编辑部署名的《号召》宣布,报纸将按照哥达的统一纲领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它将坚持革命的、斗争的立场。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是满意的。他们认为,只要党在实际上执行着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党报的一切活动就不应当偏离它。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释过了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党纲,但是由于工人们从这个纲领中领会出了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通,所以党在实际斗争中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 关于党报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

为了能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在斗争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必须坚持正确的宣传原则,并且采取与党所处的斗争条件相适应的宣传策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报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这一时期,他们在对德国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进行指导的过程中,对该报应坚持的宣传原则和所应采取的宣传策略作过一系列指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为党报确立宣传原则和与党所处的斗争环境相适应的宣传策略的。

当时,由于反社会党人法使得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无法在德国的土地上生存,党只得得到国外,到这个野蛮法令的淫威所不及的地方去出版自己的中央机关报;而在报纸的出版地瑞士,人们却仍然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然而,这张报纸虽然在国外的自由环境中出版,但它却主要是为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广大党员群众而办的。每一期报纸都要通过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发行网——“红色战地邮局”——传送到国内读者手中。因此,它就既不能象那些完全在自由的环境中出版发行,其读者也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的报刊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又没有必要象那些生活在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下的报刊那样,因过于顾及险恶的环境而畏首畏尾。这就是说,它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应当采取一种与当时党的斗争条件相适应的宣传策略:既要充分利用在国外的自由环境中出版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又要在宣传的内容和编排方面充分考虑到党在国内所处的那种严酷的斗争环境。因此,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宣传原则和宣传策略应当包括这样一些要点:

首先,要“高举旗帜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德国党领导人的通告信中,曾经针对机会主义者路·菲勒克“现在不能高举旗帜前进”的论调这样说:“到国外来不是为了高举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

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7〕有人担心这样做会给俾斯麦当局抓住把柄，被加上“侮辱陛下”、“叛国”等罪名，并把他们送进监狱，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宣传应当顾及德国的现行法律。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回答说：“这些禽兽法官不管该报写些什么，总可以找到判罪的借口。要出版一种使法官抓不着把柄的报纸，这还是一种有待发明的艺术。同时，这些先生们还忘记了，如果机关报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就会驱使我们的人民大批大批地转到莫斯特的营垒中去。”〔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如何，党报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样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应当率直而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而不能含糊其词。当然，这样做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如果谁准备承担因为这样做而带来的风险，那他“就不配站在这种光荣的前哨岗位上。”〔9〕

第二，这张报纸应当用一种能够激励工人阶级和党员群众斗争勇气的“流利而且坚定”〔10〕的调子、一种“正确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11〕来向自己的读者讲话。

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使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党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党内的悲观失望情绪也滋长起来了。这种情绪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极为不利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党报应当用高昂的调子打破沉闷的空气，发挥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可是，这种低沉的情绪在初期也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报上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東西。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进行过批评和帮助。自从1881年初伯恩斯坦接替福尔马尔担任主编职务以后，报纸的调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恩格斯很快就写信给伯恩斯坦说：“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步。‘击败者’的悲观失望的调子和傲慢骄矜的美德互为补充，小市民的温顺和莫斯特式的革命词句交相为用，还有，同莫斯特纠缠不休——所有这一切都停止了。调子变得流利而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的勇气。”〔12〕不久，他又写信给倍倍尔赞扬说：“使我倍觉高兴（马克思也感到同样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勇敢态度，它敢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布罗伊埃尔之流的哀号和怯懦”〔13〕。

第三，对于敌人的迫害和打击，报纸应当坚决地予以回击。恩格斯曾经多次写信给伯恩斯坦，称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方面的坚决态度。他还指示说：“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14〕

所谓对敌人的迫害和打击给予坚决的回击，并不意味着非要一味地使用“最厉害的字眼”、一味地进行猛烈的抨击不可，而应当采取更为有效又更为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对敌人进行讽刺、讥笑和挖苦。恩格斯在1882年6月26日致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分析过这样做的好处。他写道：“……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15〕他还在另一封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我还是劝告伯恩斯坦……，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越来越走向极端，那时它就会变得荒谬可笑了。”〔16〕

恩格斯认为，《新莱茵报》就是使用嘲讽的手段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典范。他在谈到《新莱茵报》的宣传方针时说：“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17〕《新莱茵报》正是由于主要采用了对敌人进行嘲讽的方法，才做到既打击敌人，又赢得了群众，从而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说：“正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多订户”〔18〕。因此，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方面向《新莱茵报》多学习。

（三）关于党报同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报同它的读者——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工人群众及其力量的绝对信任基础之上的。恩格斯曾经多次以自豪的口吻谈到德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他说：“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

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19〕因此，他说：“我对我国无产阶级绝对信任”〔20〕。

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必须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只有这样，它才能生存下去，才能获得力量，才能有朝气；而在当时党内机会主义经常抬头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党报才能及时地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保持正确的方向。

在谈到德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支持时，恩格斯曾经说：“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户增加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封的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21〕当时，党的领导层中的机会主义者严重地干扰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他们时而企图改变报纸的政治路线和宣传方针，时而又企图篡夺对编辑部的领导权。这就使得《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不时地出现一些错误。但是恩格斯坚信，德国的工人群众是“能够纠正和消除这一切”〔22〕的。即使机会主义者“连《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掌握了起来，那他们的统治也决不会象这个报纸最初摇摆时期那样长久，该报开始时甚至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领袖’的支持，但是群众迫使它改变了方针”〔23〕。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希望他多多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他写道：“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召。”〔24〕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党报在进行宣传时，要注意面向群众，要考虑到读者群众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解释”。〔25〕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报刊工作也是一种争取群众以壮大党的力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当时德国那种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思潮都争相争夺群众的情况下，党的报刊在这方面所负担的责任就更重了。为了把无产阶级群众一批一批地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事业中来，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应当把党报宣传的着眼点放到“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26〕身上。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许多新党员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很不成熟。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所说：“三年来，你们得到了大发展，增加了上百万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这些人没有可能充分阅读书报和听到鼓动，所以没有达到老党员的水平。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因此，他们是一种很容易受反对你们的那些钻到前面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的影响和利用的材料。……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危险。”〔27〕所以，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又强调应当把提高这些新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作为党的宣传工作（包括报刊工作）的一个重点。而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同样要注意适合这些人的水平和他们的接受能力。

（四）关于党报同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

党报同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究竟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随着党的发展、随着党内生活日益变得复杂起来而产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党报是党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报在党的领导机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党报在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下工作，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由党的领导机构来指导党报的工作，行使对党报编辑工作的监督权；党报编辑部在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机构。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些原则当然都是正确的，然而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知道，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旦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错误，党报如何才能避免跟着犯错误，而且又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和斗争来减少党的领导机构的错误给党的事业所带来的损失，以至于最后纠正这些错误呢？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在他们的后期多次谈论党报与党的领导机构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恰当地处理这一关系的原则和设想，就是旨在解决这个问题。

1885年上半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行使党的执行委员会职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右翼之间围绕着航运津贴法案问题所发生的争论，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1884年底，当俾斯麦政府为了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而向国会提出航运津贴法案的时候，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多数打算投票赞成这一法案。他们这一错误立场立即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和党的许多地方组织的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下，对党团右翼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压力下，党团全体成员在1885年2月对航运津贴法案投了反对票。可是，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多数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他们所进行的批评却非常不满。4月2日，他们以党团的名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党的机关报是

否有权批评党团的活动提出异议,企图确立自己对于党报的支配地位。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党的大部分地方组织的坚决反对下,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不得不作出让步。三个星期后(4月23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联合声明,一致确认下述两点是处理党团和党报编辑部之间关系的准则:一、《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全党的而不仅仅是党团的机关报;二、党团是党的代表机关,有权对编辑部的工作实行监督。对于这两点准则,恩格斯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并且在以后据此提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28〕的看法。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党报不仅应当是党的领导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宣传的工具,而且应当是全党的舆论机关;它不仅应当向全党传达党的领导机构的声音,而且应当反映全党的意志、愿望和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爱德(指伯恩斯坦。——笔者注)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做什么事情。”〔29〕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已经越来越注重党报对于调节党内生活的杠杆作用。而为了保证党报能够不受阻碍地、有效地发挥这种杠杆作用,就必须从体制上恰当地确定党报同党的领导机构之间关系。

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在经历了为在党的报刊上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而进行的斗争和反对把党的报刊“国家化”的斗争以后,恩格斯终于得出他关于党的报刊同党的领导机构之间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原则性看法。

1891年1月,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卡·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马克思在1875年为批判党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有严重错误的纲领而写给德国党领导人的一封信,即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的公开发表,使得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不满。他们曾企图采取“反社会党人法式的行政措施”,把载有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时代》杂志全部停售,并且警告:今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恩格斯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这种错误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说:“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1881—1888年任俾斯麦政府的内务大臣。——笔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并使他们如此紧密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30〕恩格斯在这里明白地表示,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而不应该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对待它;在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并且能够合法地进行活动(“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停止实施)的条件下更应该如此。

在1892年11月党的柏林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又发生了关于所谓报刊“国家化”问题的争论。党的国会党团向大会提出,要赎买所有新创办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并将其改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党团的这个提议。11月9日,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倍倍尔说:“如果你们的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过去给予的行动自由不仅是足够了,而且由于规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处。你们自己同时也使党对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3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不仅在这里再一次重申了党的领导机构只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的影响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党的报刊在形式上独立于党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他并且希望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主动。可以认为,这两条就是恩格斯经过长期摸索,同时又是根据当时德国党的具体情况得出的处理党报与党的领导机构的关系的原则性看法。这对于发扬党内民主、纠正党的领导机构可能发生的错误,保障党的事业健康地发展,是完全必需的。当然,党报在形式上独立并不等于脱离党的领导。这一点就是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形式上独立”,是指报刊体制上不从属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它的活动则仍然要受到党的纲领和既定策略、受到党的道德,即党内生活的行为规范的约束,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也就是党的领导机构要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思想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活动的产物。它同我们今天的党报工作实践之间有一个长达整整一世纪的时间差距,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末,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党报思想呢?

首先,应当遵循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为我们指出的对待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过这样一点,即:“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32〕因此,他们要求人们不要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33〕,到处去套用,而应当把它作为“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34〕。这是一条真正科学的原则。我们在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思想时,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他们这些思想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党报工作的公式和教条,不能完全用这些思想来剪裁今天的党报工作,而应当把它看作是我们研究报刊现象、解决报刊问题的指南。

第二,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党报思想时,必须注意到它的历史性和某种意义上的特殊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主要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工人阶级尚未夺取政权、工人政党的领导层又经常受到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在德国国内还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报纸只能在国外出版,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是在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等报刊工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它。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和他们对当时党的报刊工作所作的每一项具体指示时,都要注意到这些观点和指示所由提出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针对性。决不能不顾及这一切,而把它们教条式地、公式化地拿来衡量和剪裁今天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活动的实践。

第三,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党报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报刊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关于党报问题的许多论述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具体问题提出来的。然而这些论述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党报问题的一系列原则性看法和对党报工作的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他们论述的是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却是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党报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低估它的意义,甚至拒绝研究它。

第四,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当完整地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党报思想,而不能割裂地对待它。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些方面,只强调某些问题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另一些问题;或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只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言论而忽视他们的另一部分言论,那就会使马克思恩格斯党报思想的本来面貌受到歪曲。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失去科学性,而这对于无产阶级党报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7页
3. 1879年7月24日爱·伯恩斯坦致卡·希尔施的信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75—37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5—31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7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0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6—14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7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8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9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9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8—8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试析马克思早期“人民报刊”思想

——兼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报刊问题

· 丁 名 ·

一、问题的提出

1842年10月——1843年3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曾提出并论述过人民报刊问题。《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是比较集中的一篇。

《莱比锡总汇报》是当时德国的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1842年12月被普鲁士内阁查封。罪名是:报道一些传闻,有一半是“捏造”的;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还要“追根究底”;带着“恶毒的激情”发表自己的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行为不端”等等。其实,它不过是几位抗议国王废除宪法的教授进行了辩护,有过反对天主教的偏颇论争,诸如此类而已。但是,包括《莱比锡总汇报》在内的当时德国进步报刊,曾激起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也激起了他们的忧虑和希望、欢乐和悲哀。“它们唤起人们热烈地关切国家,使国家同它的公民亲密相联、休戚相关。”(《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194页)于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试问普鲁士当局罗列的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当然是后者。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人民报刊”的概念,并说《莱比锡总汇报》只是整个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份。这就表明人民报刊不是指某一特定的报纸,而是一个群体概念。

那么,就当时而言,人民报刊的含义和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地主贵族统治的封建割据的国家(分解成36个大大小小的邦),经济发展比英国、法国落后得多,近代工业才刚刚开始,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居多数。政治上,国王和各邦君主主宰一切。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根本不允许在报刊上讨论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不管这种讨论是多么有礼貌,多么温和。1840年,新国王弗一威廉四世上台,他的某些虚伪的自由主义的许诺,曾给德

国的资产阶级带来期望。他们以为国王会恩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权力(出版自由、代议制等)。但1841年12月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从表面词句看似对出版自由的限制有所放松,而实际上依然是控制得很紧的。正如马克思所揭露,它“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5页)资产阶级企图靠恩赐获得权力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十分不满,开始采取反对派的立场,攻击封建专制制度。

《莱比锡总汇报》自然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舆论的。它对封建官僚统治的祸害要“追根究底”,对专制制度的攻击“带着恶毒的激情”,那是必然的,也是进步的。它符合当时德国人民——工厂主、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人、农民的利益,反映了他们和封建势力斗争的愿望和要求。马克思称之为人民报刊,按其本质自然是资产阶级报刊。

马克思还明确讲过,这种报刊在英国、法国都存在过,它们初期都有过如此的特征,都遭受过类似的指摘。这就证明马克思所讲的人民报刊,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报刊,即资产阶级民主报刊。

二、马克思设想的人民报刊

马克思当时主编的《莱茵报》,毫无疑问也是人民报刊。马克思自己就曾把它和《莱比锡总汇报》并列,并认为前者适合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口味,后者适合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口味,亦即各有特点而已。

《莱茵报》是莱茵省资产阶级创办的,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的情绪,自然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报刊范畴。可是当马克思担任主编后,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报刊,而具有维护劳动群众利益、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

这种人民报刊为什么会产生、出现呢?马克思有过如下一番论述(参阅《马克思全集》第一卷《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莱茵省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由于捐税太重,葡萄酒跌价,大批处于极端贫困和破产的境地。地方当局不仅不采取治理措施,还掩盖事实真相,说农民求助的呼声是“无耻叫嚣”。而农民呢,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十分穷苦的往往不善于说话,能说话的又不是最贫困的;而且讲话人总不免受个人遭遇的局限,往往从自己的得失出发说明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介绍、分析整个农民贫困的情况。这样,他们的诉苦就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了。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马克思认为: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自由报刊”(马克思认为自由出版物具有人民性,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表露,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由报刊和人民报刊的含义是一样的)。这种报刊应该是政治的因素,但不是官方的因素,不以官僚的意志为出发点;它是市民的因素,但不直接和个别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它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也就是能理智地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在自由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而且此时双方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权利平等的关系”。这种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它可以不通过任何官僚的中介,原封不动地把人民贫困的状况送到国王面前、国家权力面前,以期获得普遍的注意和同情……

这是马克思理想的人民报刊。然而在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并没有能出现这样一种报刊。但我们根据《莱茵报》的实践,完全可以认为它就是这样一张报纸,而且是当时德国人民报刊的代表。它的政治纲领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可是它却维护穷人的习惯权利(最低下的受压迫的无组织群众的权利)。它为捡枯枝的农民辩护,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申诉,“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141页),坚决抨击封建统治的压迫、奴役政策。《莱茵报》确实反映了贫苦群众的舆论,又进一步扩大和推动了这种舆论,以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它的宣传使统治者难于容忍,却给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茵报》被封(为农民说话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地农民便向地方当局递了请愿书,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是否发过虚假的报道,是否诽谤过当局,但是我们知道,它确实写过关于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状况,关于我们的权力和我们命运的真实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设想的超越于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上的报刊,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在根本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双方不可能以平等的关系相互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为治于

人者的利益说话,就不会让治人者肆意污蔑、攻击而不加申辩、驳斥,而这,又必然不会为治人者所长期容忍。《莱茵报》本身被封的遭遇便是最好的证明。

三、人民报刊的含义和实质

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新莱茵报》,还是不是人民报刊?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这样提过。马克思说,六月革命(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灵魂就是《新莱茵报》的灵魂;恩格斯明确讲,《新莱茵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报刊。如果为了与《新莱茵报》以前的人民报刊(资产阶级民主报刊)相区别,自然可以不称它为人民报刊。但是《新莱茵报》在当时举起的是民主派的旗帜,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自己的任务,马克思也曾把它划入自由报刊一类,因此,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仍然属于人民报刊。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切反对封建地主贵族统治的阶级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呼声愿望的报刊,都是人民报刊。当然,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人民报刊提出的政治民主,以及财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审判自由等口号,不仅基本上是以唯心主义世界观来解释它的,而且它首先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因而这一时期的人民报刊,其实质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报刊。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特别当它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既把反封建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和资产阶级联盟,但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时代表着它的观点和利益的报刊,尽管仍然属于人民报刊的范畴,但其实质是无产阶级报刊(如《新莱茵报》)。无产阶级报刊最能完整地体现人民报刊的革命精神,成为民主斗争的旗帜,所以它是人民报刊的左翼,主流。至于某些资产阶级报刊,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可能和封建势力妥协、勾结,出卖革命利益,背叛工农,那就不再是人民报刊,而是资产阶级反动报刊了。

同样,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阶级报刊、小资产阶级报刊(不免分化,或则靠拢工农转变为无产阶级报刊,或则接近资产阶级最后堕落为资产阶级报刊),都是人民报刊,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自然不再属于人民报刊。至于打着“工人报刊”招牌,叛变无产阶级利益,成为资产阶级附庸和走狗的报刊,当然也不是人民报刊。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无一己之私利，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也就是人民报刊。它可以因为具体任务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而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特点，但就其实质讲，其中不再可能出现代表其他阶级观点、利益的人民报刊（指面向广大群众的公开的报刊）。因为，离开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至于打着“人民报刊”幌子出现的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报刊，那不是真正的人民报刊，而是反动报刊。自然，如果历史出现曲折，无产阶级报刊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那它也不再是人民报刊，同时还可能出现真正的人民报刊来反对它。

总之，人民报刊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报刊，彼此不能划等号。同一名称的报刊，在这个时期可以属于人民报刊的范畴，在另一时期，可能不再是人民报刊。人民报刊在阶级社会里，归根到底还是阶级的报刊。它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判断人民报刊的实质，依然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四、为什么强调阶级的报刊又是人民报刊

据上所述，人民报刊实质上是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报刊，那它又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人民报刊呢？为了吸引、团结和领导自己广大的同盟者，推进革命运动，夺取革命胜利。

比如，《新莱茵报》实质是无产阶级报刊，但恩格斯讲，当时还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一点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马克思选集》第四卷第178页）这就是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新莱茵报》只有举起民主派的旗帜，强调自己是自由报刊，民主报刊，人民报刊，才能更好地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推动运动的发展，并在斗争中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否则，在沙漠中布道，必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斗争，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

1956年，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符合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当时，人民日报在改版《致读者》的社论里，就再一次强调“人民

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应该尽量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强调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报刊是人民报刊，好处是：第一，使它们时刻不忘记自己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他们服务，才能动员、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夺取胜利。自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报刊是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做到这一点的。第二，对无产阶级报刊来讲，可以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进步报刊在革命时期的积极作用，努力团结他们，扩大统一战线，增强革命力量。

但是，我们也时刻不应忘记人民报刊的阶级属性。这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报刊必须自始至终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必须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观察、处理问题，决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模糊自己的革命目标，降低自己的水平，使自己混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报刊。第二，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民报刊，保持清醒的头脑，既鼓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进步性，又注意它们的变化，对它们不利于革命的言行及时给予批评、帮助、斗争，直至划清界限，与之决裂。这在我们无产阶级报刊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五、学习马克思关于人民报刊与人民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早期关于人民报刊、自由报刊的论述，对封建专制统治扼杀言论出版自由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对进步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他的论文，曾被当时德国的左派政论家卢格誉为“关于出版自由，以及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从来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尽管其中有些观点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一般民主主义报刊，是工人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的先驱”（《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240页），马克思的论述对以后的人民报刊的主流——无产阶级报刊，还是有深刻意义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发展，它已构成整个无产阶级报刊理论的一个组成部份，因而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启发的。

这里着重介绍马克思关于人民报刊与人民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说过“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234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旧社会，我们目睹过人民报刊与反动报刊在人民心目中的悬殊地位，以及它们与人民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人民对反动报刊嗤之以鼻，它只能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作为

人民报刊主流的无产阶级报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它则是意气风发，所向披靡的。其它进步报刊，当它和人民联系密切时就勇敢振作，反之不免萎靡徬徨。就是解放以后，我们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报刊从本质上讲，是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的，但是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仍然可能脱离群众，甚至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这样，我们的报刊就难免装腔作势，强辞夺理，不为人民欢迎。马克思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从另一侧面提到：在普鲁士封建专制的书报检查令的压制下，德国“人民本身已失去了对祖国事情的兴趣和民族感”，这就不仅使报刊失去创造力，也失去了取得人民信任的唯一先决条件。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人民报刊必须时刻注意人民的思想、情绪，如果人民失去远大目标和政治热情，就不会对报刊感到兴趣；反过来，人民报刊不正应该竭力让人民对祖国的事情发生兴趣，并激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吗？这样我们的报刊就一定会获得人民的信任（当然还有其他条件），自己也会是朝气蓬勃的。

马克思还说，人民报刊应该是“有声的”，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187页），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同上第74页）。什么是“有声的”？即发出的舆论能够得到反响，就证明是“有声的”。没有反响，文章再长，标题再大，也是“无声”的。而这种声音，马克思讲，首先应触及到生活的本质方面，“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同上第188页）。

因此，马克思提出报刊应“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同上，第187页）。这样，它才能把人民的本质反映出来。人民的精神，“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同上第75页）。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75页）。这就是说人民报刊应该全面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既反映革命进取、创造历史的一面，也反映由于受到各种旧势力旧思想影响而需要克服的消极的一面。这样，人们每天接触报刊，才能从中正确地认识自己，估量自己，使自己日益聪明起来，不去干那些荒唐愚蠢的事。马克思借用宗教语言讲，公开忏悔，真诚坦白，是可以得救的！

还有一点，马克思曾较多地强调人民报刊有代表人民、代表社会进行监督、揭露的职责。他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造成了这种结果：“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21页）他写《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时认为“报刊有责任揭示一般情况”。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报刊依然有监督、揭露的职责。自然，它的目的不再是破坏、推翻旧政权、旧制度，而是维护、巩固新政权、新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刊的这种监督、揭露作用更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一切不利于人民的东西都将受到批评和清除，这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

启 事

本刊为不定期刊物，不接受预订。

本刊尚有少量存书，读者如在本埠买不到，可汇款来函购。第一期每本五角七分，第二——六期每本六角五分（邮费及挂号费在外）。

马克思和新闻学

· 徐培汀 ·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创始人，也是共产主义新闻理论的奠基者。《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第一篇政论；报纸工作，既是马克思从事革命斗争的武器，又是他第一个社会职业。

为了学习与继承马克思的新闻学说，本文试就下列三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索：

- ① 马克思新闻学说形成的条件；
- ② 马克思的办报实践及其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
- ③ 怎样看待马克思的新闻学说。

(一)

马克思的新闻学说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德国，有它时代的条件与思想渊源。

① 从地理环境来看，德国是欧洲印刷术的故乡，第一张印刷报纸的诞生地，世界新闻学术的发源地。

1450 年，德国美因兹的约翰·谷腾堡 (Johann Gutenberg 1400—1468) 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开辟了近代欧洲的印刷时代。

1568 年，德国印刷的《特别新闻》(Extraordinari Zeitungen) 出版，单张，不定期刊。

1609 年，德国的《报道或新闻报》(Ariso rala-tion oder Zeitung) 出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印刷周刊。

1660 年，德国的《莱比锡新闻》(Leipziger Zeitung) 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印刷日报。

随着印刷报纸的发展，从 17 世纪开始，一些大学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新闻学研究，最早在德国出现。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办过报纸，也论述过报纸；叔本华，更写过报学论文。

② 从思想渊源来说，1644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口号，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的《人民之友报》的办报实践，人

权宣言的公布，1791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19 世纪初叶德国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等等，客观上为马克思新闻学说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

但马克思与他的先辈毕竟不同，他改造与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报刊学说所取得的成果，表达了真正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抱负。

③ 从时代背景来看，19 世纪 30—40 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同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境内三十四四个邦、四个自由市虽在名义上组成一个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但各邦都是独立的，各有各的政府、议会、军队、关卡和货币，严重地束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知识分子和资产者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和统一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实行出版自由和代议制，争得一部宪法。由于没有出版自由，就不能有工人运动，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从争取出版自由出发来创立他的新闻学说，“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指出版自由）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96 页）的意义了。

(二)

马克思的新闻学说的形成，前辈的思想资料是“流”，办报实践是“源”。理论来自实践，丰富的办报实践，形成马克思精辟的新闻学说。

马克思参加编辑、指导过的报刊有：《莱茵报》、《德法年鉴》、《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人民报》、《寄语人民》、《工人辩护士报》、《民主周报》、《人民国家报》、《前进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

在欧洲反动年代，他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美国）、《新奥德报》（德）、《新闻报》（奥）撰稿，利用这些报纸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资产阶级报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的反动面目。

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新闻学主要的贡献有：

① 关于出版自由

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治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梅林：《马克思传》）

第一，理论的透彻。

马克思把书报检查比作使夜莺失明，强制给自由人削发一样的残忍无理，称之为“拙劣的警察手段”。同时也指出了书报检查的笨拙、无效，书报检查的结果，使每一本被查禁的书，不管是好是坏，都成了“不平凡